

世界现代史的 主线和体系

于沛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现代史的 主线和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和体系 / 于沛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004-9121-7

I. ①世… II. ①于… III. ①世界史: 现代史—研究
IV. ①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9197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周昊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41 千字

定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这一史家必遵的“通理”，已经被彻底摒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外国都是如此。现在，国别的、地区的，或是世界的现代史研究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历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社会功能进一步得到实现。在我国世界史学界，对“世界现代史”有两种理解，其一，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史，则被称为“世界当代史”。其二，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史，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合为一体。本文集从标题到文章内容，都是在第二种意义上界定“世界现代史”的。在当代中国，历史研究要关注现实，要不断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已经成为史家共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世界现代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的30年间，已经有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现当代史”著作20多种公开出版，至于世界现当代史研究论文就更多了，数以千计决不为过。我国的世界现当代史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这不仅仅是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结果，这自然是重要的原因；同时我们也应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也是时代的呼唤，是现代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使然。

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史离不开具体的历史事实，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过程，如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西方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与演变、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和振兴、新中国成立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20 世纪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等。然而，仅仅这些是不够的。因为了解“具体的历史事实和具体的历史过程”，远不是研究和学习世界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关键是要通过认识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特征和总趋势，科学认识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坚持彻底的唯物史观，使他们在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以及预见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时总是坚持规律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斗争的过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马克思同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是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上述结论，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世界近代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特点和趋势的分析中得出的。这些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今天通过对世界现代史的学习和研究，我们会有更深刻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不是抽象的概念的推论或演绎，而是建立在生动、丰富、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无论是世界近代的历史，还是世界现代的历史，都充分证明了这一切。列宁说：马克思“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是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列宁认为，“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③。列宁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但他的上述论述，对于我们学习、研究世界现代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历史研究从来就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6—187 页。

是史料的堆砌或整理，而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揭示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洞悉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趋势。

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当我们在撰写一部新的《世界现代史》教材，在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时，不能不把认真研究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和体系提上日程，这是我们避免或就事论事；或割裂世界现代历史内在联系；或碎化世界现代历史科学体系；或食洋不化，照搬照抄西方学术观点的具体措施。探究世界现代历史的主线，有助于掌握客观历史真理的本质内容，这是撰写一部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世界现代史》的基础和前提。在我国，研究世界现代史的理论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一支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坚实专业知识的世界现代史研究队伍已经形成；一批具有一定科学水平和社会影响的世界现代史著作相继问世。此外，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和体系的讨论始终在进行。早年发表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世界历史》等刊物上的一些论著，作为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页，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对今天讨论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和体系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的传承不应割裂，也不可能割裂，因此，本文集的作者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现在的世界现代史课题组成员为主；第二部分，以活跃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史学家为主，本文集选收了 6 位教授多年前的作品。

前已述及，本文集是撰写《世界现代史》教材的阶段性的成果，因此，这部文集的内容不仅仅是从理论上探究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和体系，而且一些作者还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表述如何认识现代历史研究中的主线和体系。在世界现代历史研究中，特别是研究和撰写《世界现代史》时，不能脱离中国史。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仍存在不少实际问题有待探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中国史，不应该成为这一研究的“点缀”，或可有可无的“附属”。实际上，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不少问题，若脱离开中国历史，很难进行深入的、有说服力的阐释，反之亦然。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中国历史的世界史，是不完整的世界历史；但是，这绝不是说要将中国历史的所有内容，都移入到世界历史中。因此，我们更多的是在强调，从中国和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以及互动关系中，去研究和撰写世界史中的中国历史部分，本文集也

选收了这方面的论文，就如何撰写世界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与世界”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为了繁荣和发展历史科学，在探讨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和体系时，我们应当切实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正常的理论争论和学术批评。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或学术是非，不应简单评判、宣布对错，而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展开对话、讨论，使真理越辩越明，澄清模糊的或错误的认识，推动历史科学的进步。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我们鼓励大胆探索，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发展真理。这部文集的编撰，即是在努力体现上述原则，用实际行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

无论是探讨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和体系，还是撰写《世界现代史》教材，我们都要自觉继承并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既反对西化，也反对僵化。我们同国际史坛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自觉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高度，有选择地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为我所用，但是，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史学理论、原则和方法，我们要有自己的史学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在这方面，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以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致力于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用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的经典力作作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对当时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也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时代变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在本质上并没有变化。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时，发展新的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有利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愿本文集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撰，而且对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能做出力所能及的微薄贡献。

于 沛

2010年6月29日

目 录

前言	(1)
关于“世界现代史”主线和体系的理论思考	于 沛 (1)
坚持唯物史观 吸收最新成果	
——对编纂世界现代史教材的一些看法	徐 蓝 (23)
历史分期与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李世安 (33)
关于世界现代史体系之我见	黄民兴 (46)
对世界现代史编纂的几点看法	吴 英 (59)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世界历史影响的再认识	胡德坤 (73)
百年来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变化	孟庆龙 (81)
论 20 世纪拉丁美洲历史的主旋律	韩 琦 (102)
印度资产阶级与印度的发展道路	王红生 (125)
自由与平等的博弈	
——解读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三次调整	许 平 (143)
试论“新殖民主义”及其对中非关系的困扰	刘乃亚 (150)
世界现代史体系建构中的中东社会史研究	韩志斌 (165)
论日本现代史的断代	张经纬 (177)
20 世纪 80 年代罗荣渠先生关于世界近现代史体系	
的思考	王加丰 (192)
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形成	项观奇 (202)
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	胡钟达 (220)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是科学假说	朱本源 (242)

2 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和体系

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罗荣渠 (262)
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	郭圣铭 (284)
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刘绪贻 (299)
后记	(315)

关于“世界现代史”主线和体系的理论思考

于 沛

历史分期问题，历来是历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历史研究实践中无法绕开的实际问题。可以说，任何一个研究者从开始思考、确立其选题时起，就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历史认识、历史价值判断的基础或前提。正因为如此，随着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理论描述日渐突出，历史分期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在中外历史研究中，都可清晰地看到这个不争的事实。

关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分期问题，我国学者提出有“社会形态转变论”或“经济类型转变论”，“政治变革论”、“社会形态更替论”或“社会发展质变论”，“意识形态先行论”，“资本主义整体论”，“世界整体论”，“较多国家代表论”，“社会经济发展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论”，“现代化主线论”、“三大部类综合关系论”等不同的观点。^① 这些观点在研讨世界现代史的分期时，也有不同的表现。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也有多种不同的阐释。例如，关于“三大社会形态”、“五大社会形态”的争论，认为“三大社会形态”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宏观”描述，而“五大社会形态”则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微观”描述。一些研究者不仅提出“社会历史发展道路是单线还是多线”的问题，而且还就这个问题提出以下六种观点：单线论、多线论、先单线后多线论、一元多线论、一般性与多样性统一论、常规与变异论等。这些不同的观点表明，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对推动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进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 参见赵文亮《近20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近代史分期问题研究》，《史学集刊》2008年第1期。

本文不拟对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评述和讨论，而仅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历史科学的实际出发，并赋予其世界历史的眼光，就如何认识“世界现代史”的主线和体系略陈管见，以期引起学界同人的关注，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划分时代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关于“时代”，在不同的领域运用，往往会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含义。本文所谈及的时代，是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时代。“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①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在马克思看来，所谓“时代”，是指经济时代，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区分时代的主要标志。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划分人类历史的时代，或科学地进行历史分期，只能以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社会形态为划分标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他们还认为，“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③。将这些观点应用于认识时代的本质内容，进行历史分期，同样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对于社会形态演进问题所做的扼要表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④，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最初形态，因为上述四种生产方式，再加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5—52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得出的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结论，合计有五种。但是，并不能据此就认为，马克思强调的是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社会发展，都必然是按照这五种生产方式循序演进的。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发展道路。例如，有些国家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有些国家可以不经资本主义，有些国家可以不经封建社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是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视角来谈的，他所强调的人类历史规律性的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五种社会形态”的序列，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序列，其核心内容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和规律性，将社会形态的更迭理解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论证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近年国内理论界一些人对此提出疑问，有人认为，“五种生产方式”说系出于列宁、斯大林，而同马克思本人的历史观迥然有别。他们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缺乏充分的文本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部落所有制”并非“五种社会形态说”者所理解的原始社会。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简单地解读为原始社会生产方式，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将五种社会形态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循序递进的普遍规律，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一句“大体说来”已经从文字上表明，马克思并无意将他的结论作为世界发展的唯一图式，而只将其看做基于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得出的大概认识。马克思生前对于把一种类似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历史分期模式强加到自己名下表示了明确的反对。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人提出，亚细亚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是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是同属原始社会解体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对上述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一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一文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19世纪60年代在《资本论》中，1881年在给查苏里奇的复信（及草稿）等著作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等著作中，也都论及社会形态演进问题。在唯物史观的奠基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生产力的角度将人类历史分为游牧经济、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等，而是从所有制

的角度，将人类社会发展，从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以及没有直接提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诸方面加以说明。

1897年列宁在为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写的书评中讲道：政治经济学应该这样来叙述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即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资本主义时期。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中再次勾勒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脉络。1938年，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指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不难看出，“五大社会形态”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并非是斯大林个人提出来的，至于说是因斯大林提出，而使“五大社会形态”说成为“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就更没有道理，讨论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

我们认为，这一学说是“马克思从人的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从生产力、生产方式这些对象化的客体着眼，对社会历史过程所作的科学抽象。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是划分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一般发展规律，尽管这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各个国家或民族必须要普遍经历的发展模式，因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是就世界历史的范围而言的，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而言的。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的详细记述，以及远古以来的人类历史进程事实本身，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上述基本认识，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进步性规律出发，可以认为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时代；五个时代之间又各有其过渡时代，我国即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过渡的时代。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是“纯粹”的，在一种社会形态中，除了“过渡”的形态之外，还有“交叉”的形

^① 刘曙光：《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态。这样，就要求人们在认识时代的特征或划分历史分期时，既要看到其本质内容，又要避免从公式或概念出发，以期从实际出发。人类历史进程表明，在同一种经济基础上，可以存在多种具体的社会形态。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历史阶段，同样如此。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共性，从来不否认每一民族从实际出发，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不应把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完全对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体进程的理论，在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中有广泛影响。例如，吴于廑、齐世荣教授等在他们的著述中都写道：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存在互不相容的矛盾。^① 历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就是因为它正确。……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 19 世纪所创造出来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的继承者”^②。在划分历史时代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作为标准，是历史研究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具体体现。

二 世界现代史的主线：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世界现代史最重要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① 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当代卷》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8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1—442 页。

出现了从一个到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从没停止过，有时是十分激烈、甚至殊死的斗争。20世纪末发生了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但是社会主义依然存在，进入了与资本主义斗争、合作的新的发展阶段。世界现代以来的历史昭示未来，社会主义的前途光明。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客观的历史矛盾运动，是人们自觉地创造历史的现实运动。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深刻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问题，说这是一个“长久的阵痛”的过渡时期，而共产主义社会将依次通过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才能实现。“初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都面临着十分艰巨复杂的革命和建设任务。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②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对于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这一过渡时期的本质内容，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一些人否认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之一，是对现时代性质的认识，存在种种混乱。时代的性质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这一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盾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是无法自行得到解决的，尽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矛盾可能得到缓解，但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不可逆转的。

1895年2月，恩格斯逝世前不久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恩格斯还从19世纪末欧洲的实际出发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①恩格斯的这篇《导言》自发表以来就遭到歪曲和篡改，当时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宣扬，恩格斯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的主张”，主张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主张“无论如何要守法”等等。恩格斯当时即对《前进报》的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抗议，抗议对他的观点的歪曲。因为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至1870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时，虽然对以往自己对革命形势过高的估计进行了修正，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包括暴力革命在内的“革命的权利”，因为“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②。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恩格斯的反思和他当时的遭遇，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历史时代，这是时代的本质特征。战后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进行改良或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实施高福利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充分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0、512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一切都是以不威胁资本主义的生存、不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不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为前提。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但经济全球化并非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历史阶段，全球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化。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发挥完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社会主义就还得和资本主义在同一个地球上并存下去。

资本主义迈出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步，资本主义主导着今天的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新自由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中的理论表现。不择手段地追逐利润，维护国际经济竞争中强者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广为传播，被认为是“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在经济全球化的广阔背景下，参与这一进程的任何国家和地区，以及它们的发展模式，诸如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瑞典模式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印度模式、东亚模式和非洲模式等，都不避免地会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全球化的前景是否建立起永恒的资本主义世界统治？否。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现时代的本质特征，有了更具体、更清醒的认识。

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保持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的同时，成功地保持了中华民族的自主性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自主发展道路。中国满怀信心地向世界敞开国门，主动地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学习，但决不成为它们的附庸；中国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但始终强调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决不会走依附型的发展道路。

经济全球化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日趋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列宁曾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